

启动我国都市人类学创建的契机

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综述

1989年底至1990年元月2日,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际人类学及民族学联合会所属都市人类学委员会批准的国际会议,由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承办。参加会议的40位学者中有25位是国内学者,15位国外学者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荷兰、苏联和南斯拉夫。

为期6天的会议中宣读并评论了53篇论文,讨论了都市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问题以及未来合作研究的计划。

以都市人类学为专题的学术会议,在我国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首例。之所以将会议地点定在中国,对西方学者来说,可以通过对中国城市经验的研究,丰富和修正西方的都市理论和人类学思想;对中国学者来说,这正是促进人类学在中国被接受和重建的契机。

一、都市人类学的简单过程

都市(城市)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研究内容和范围来说,又是近10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学科(胡绳)。过去,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商业化的部落社会,但当今世界的情况对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其一,所谓“原始”部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仅研究题目遇到困难,况且将这些部落仅仅作为原始社会的“遗迹”,带着殖民主义的意味;其二,近年来世界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正在加快,世界上已约有48%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下个世纪初,将有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必然带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化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排除在人类学的研究之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许多人类学家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处于经济发展主流,人类大量人口生活的地方——城市,出现了城市人类学(陈鹏)。

对于城市的大量的研究,以往主要是由社会学做的,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又主要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城市生活。西方城市的模式被不少人视为世界不发达地区所有都市社会的必然归向。近年,有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在若干非西方国家地区开创了对城市的研究,但是富有悠久的城市历史,并在近代体现了独特的都市经验的中国,却完全被排除在了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作为世界的一个主要经济及历史都市区域,中国是唯一的应当受到重视然而却被忽略了的地区(索撒尔)。承认所有文化的价值等同,是人类学的传统。因此,西方一些富有经验的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到中国的都市过程、都市模式或都市生活,希冀通过理解中国的经验,审视西方的都市模式和规划,反思原有的都市人类学思想。这次国际都市人类学会议在中国举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背景。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几十年来基本上是包容在民族学研究之中。而民族研究直到现在仍然只限于对分数民族的研究,而且长期着重于农村。然而事实上,中国的城市人口在过去30

多年中，增长近3倍，而城市人口中绝大多数为汉民族，对汉民族的历史的研究、城市中民族关系的研究已经为都市人类学提出了诸多课题（阮西湖）。因此，这次西方富有经验的人类学家与中国学者相互切磋、撞击，确为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创立和发展，提供了良机。

二、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的学科分布和论文题材都十分广泛。参加者中除一部分人类学专家外，还有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临近专业的研究者，尤其在中国的学者中占了大多数。提交的论文都是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西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生活的诸种问题。经会议秘书处确立，归纳为几个专题：

（一）都市人类学及其对于古今中西都市的理论观。

本次会议的美方主席艾丹·索撒尔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都市人类学学会前任主席）在谈到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按照传统作法，人类学的兴趣局限于小型、孤立、非西方、一般属国家出现前阶段的社会，这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重视超越种族中心论，人类学一贯对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情表示关注。他指出，马克思早在1856年就指出过同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转变相适应，城市同乡村的关系也发生一系列转变，即，亚细亚方式：城乡尚未分化的整体；古代方式：城市乡村化；封建方式：城乡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方式：乡村城市化。可惜这一人类学思想很少受到注意。鉴于中国城市具有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而又未曾中断的文化传统，他打算用有关中国城市和国家的记载验测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城乡之间关系变化的理论。

阮西湖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是本次会议的中方主席，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对中国都市人类学总任务的看法。他认为应当从人类学角度把都市社会各方面作为整体来研究。都市通过民族文化反映民族特点，而各民族居民通过都市这个场所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关系、民族发展趋势、文化变迁、社会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协调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均为都市人类学的任务，具体来说有5个方面：（1）民族地区的城市研究；（2）城市民族关系研究；（3）汉民族研究；（4）城市民族史的研究；（5）城市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比研究。

（二）中外城市过程及模式比较。

与会者介绍了他们各自对东京、香港、印度、印尼、苏联、非洲及对上海、西藏等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和城市模式的研究和比较，分别涉及了城市的组织和结构、城市的制度、城市的物质方面一如城市规划、城市的层次和联系一如城市在国家中所处的不同层次及城市内部的层次联系、城市化过程等问题。

彼得·纳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详细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城市政府与市民及政府内部的分层，以及之间的联系，指出城市不只是谋生之地，而是社会体制的一个部分。郭彦弘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了香港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变迁过程指出：殖民地化所留下的在制度上的遗产，是人类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领域。这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

班纳吉教授（印度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以印度加尔各答及中国上海两个城市为例，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指出它们的发展经历均违反传统的西方模式，因此，西方的城市模式和都市化理论已经基本上无法解释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出现的城市经验。在

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现代化中，有5个密切相关的分析领域值得考虑：（1）建筑型式；（2）控制与干预的文化；（3）收入分配；（4）技术间断性的实质与程度；（5）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的关系。

（三）城市中的民族关系。

这个专题中主要集中了对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熊郁以大量的数字，描述了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动。30多年间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增长了2倍，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汉族。少数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少数民族的水平，而且比全市的1.61低0.11。她认为，影响生育文化的主要因素有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规模向小型化的变化、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为少数民族所接受。

纳日碧力戈（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和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则通过对呼和浩特市蒙汉通婚状况和拉萨市居住格局的研究，着重于城市间民族关系的发展。

在讨论城市中民族问题时，民族识别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民族识别是根据国家政策和实际情况进行的。1982年以来由于更改民族成份带来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在统计上的大幅度增长（熊郁），但是全国却存在80多万人在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没被承认，主要就在于民族归属不清。有的国外学者认为，民族成份的识别，政策的关系要大于选择的结果（杜磊）。也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一词，外国人使用时与中国人不一样（顾定国）。总之，在研究城市中的民族问题时，民族识别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四）从农村到都市的转变。

这是本次会议中发言最多、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通常认为，所谓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在中国，“城市”或“城镇”的建立是根据国家建制决定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将人们分为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两种身份，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中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混乱过程。但近10年来，中国的确出现了城市化的浪潮，小城镇的繁荣，乡村工业的发达，使得大量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农村经济比城市得到了更快的发展。石奕龙（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通过厦门郊区两个村城市化的调查，提出，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不可能象西方等国家一样，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道路，而是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生活方式逐渐趋向于城市或生活的转变途径来完成。顾定国教授（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和约翰逊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对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对珠江三角洲一带来说，旧的乡村等于农业，城市等于工业的公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人员、商品、资金和信息大范围流动，整个地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一种受香港影响的珠江三角洲文化也正在形成。因此，顾定国教授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过程。

（五）都市社会组织及政治经济。

索林杰教授（美国加州大学）调查了“计划单列”城市——武汉，提出了城市的政策如何从等级制向网络制的过渡问题。杜磊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的回民研究，其中特别研究了北京市牛街地区的回民经济承包活动。刘炳福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谈到上海市老年人的家庭生活。此外，还有若干论文涉及到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如犯罪问题、农村人的文化适应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妇女问题等等。

这次国际人类学会议不仅是思想的交流、研究成果的交流,同时体现在各学者的论文中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每个与会者,尤其是刚刚起步的中国研究者都不无启发。有的国外学者特别强调了人类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方法,应是参与观察方法,不仅是用采访、问卷等外部观察法,而且是参与所研究的日常生活(索撒尔)。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则指出,除参与观察外,还有整体研究方法,将城市作为整体,进行多学科、多种方式、多种理论的比较研究;再有跨文化比较法,即设立重要的要素进行跨文化的比较。

筹备两年多的这次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满意,国内外学者热烈而紧张的讨论说明都市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有着潜在的诸多课题和巨大的诱惑力,会上有的国外学者迫切地希望能与中国同行合作,以利于到中国来从事研究。

(谭 深)

社会学的重建、探索和突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韩明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上撰文,概括回顾了我国社会学十年来恢复发展的简要过程和成果,论述了费孝通教授领导的“小城镇和城乡发展研究”课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学学科建设作出的贡献。文章认为,这项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小城镇和乡镇工业发展模式理论——为中国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还指出,在这项研究工作中,通过大量的调查实践,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也有了新的突破。

作者从下述六个方面归纳了小城镇和乡镇工业发展模式理论:(一)小城镇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小城镇是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从发展小城镇做起。中国亿万农民的出路除了一部分靠农业改革的深化和拓宽,一部分靠大、中城市的发展来吸收外,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出路问题还要靠小城镇的发展来解决。(二)乡镇企业的兴起是小城镇发展的基本动力。乡镇企业代表着农村新的生产力,它的发展打破了把工业办在大城市,人口集中在大城市这二、三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老路,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对于乡镇企业的兴起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全面理解。(三)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我国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国沿海诸省主要存在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三种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类型。(四)小城镇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小城镇是克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对城乡社会经济结构重新组合的主要承担者。(五)小城镇的发展冲击着农民的思想意识和家庭生活。农民的商品观念不断增强,居住圈域和家庭结构也在改变。(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于如何发挥民族特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从“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出发,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必须充分利用其传统的民族优势求发展;同时还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各个不同社区的协调发展。